

中国史学 思想通论

· 历史编纂学思想卷 ·



◎ 吴怀祺 主编

◎ 白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史学 思想通论

· 历史编纂学思想卷 ·

◎ 吴怀祺 主编

◎ 白云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吴怀祺主编;
白云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211-06226-3

I. ①中... II. ①吴... ②白... III. ①史学史: 思想
史—中国②历史编纂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②K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0646 号

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TONGLUN · LISHI BIANZUAN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吴怀祺 主编 白云 著

责任编辑: 史霄鸿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3

开 本: 730mm×990mm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2

字 数: 359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226-3

定 价: 4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 1

第二节 史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 4

一、史学思想 4

二、历史编纂学思想 7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历史编纂学的变革 9



第一节 历史编纂学的产生和发展 10

第二节 学术思潮的嬗变与历史编纂学的变革 21

第二章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二重性特征 37



第一节 客观与主观 37

第二节 天命与人事 41

第三节 直书与曲笔 48

第四节 实录与名教 52

第五节 审慎看待史学二重性 55

第三章 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基本
问题 59



- 第一节 史书的编与著 59
- 一、述、作、论 59
 - 二、著、编著、编 65
- 第二节 史书的体裁与体例 66
- 一、体裁 67
 - 二、体例 70
 - 三、名与实 73
- 第三节 史法与史意 76
- 一、史法 77
 - 二、史意 81
- 第四节 通代与断代 85
- 第五节 历史表述 88
- 第六节 德、才、学、识 91

第四章 《春秋》与传统编年体的史学
观念 95



- 第一节 《春秋》的史法和史义 95
- 一、通与殷鉴后世 96
 - 二、仁与内圣外王 99
 - 三、礼与属辞比事 101
 - 四、信与书法不隐 103
 - 五、忠与亲亲尊尊 106

第二节 叙事与论史相结合	108
一、言事相兼，史论相融	108
二、“惩恶而劝善”	111
三、“尽而不污”	114
四、“婉而成章”	115
第三节 “通比其事，例系年月”	117
一、“通比其事，例系年月”	117
二、“嗣赏罚，辅法教”	119
三、“立典有五志焉”	121
四、“区分类例，见微察著”	122
五、“抑百家，崇圣典”	124
第四节 “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	126
一、“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	127
二、“通各代成一史”	129
三、“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	131
四、“借其年以纪事尔”	136
五、“叙所以取此舍彼之意”	138
第五节 实录体及其编纂观念	140
一、皇权中心意识	141
二、鉴戒的观念	145
三、求实的观念	148
四、求新的观念	150
第六节 纲目体与朱熹的编纂学思想	152
一、纲目体的创立和发展	152
二、朱熹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154
第五章 从前四史看纪传体编纂观念的 变化	162

第一节 《史记》：司马迁的通变思想与	
“成家立言”	163
一、“通古今之变”	163
二、“成一家之言”	173
三、“志古自镜，述往思来”	179
第二节 《汉书》：班固的皇朝意识与断代为书	180
一、皇朝意识与宣汉思想	180
二、断汉为书与“上下洽通”	185
第三节 《三国志》：陈寿的全局意识与人物品第	188
一、总揽三国的全局意识	188
二、重视人物品第	194
第四节 《后汉书》：范晔的类例思想与整体史观	199
一、以类相从的类例思想	200
二、“正一代得失”的整体史观	204
第五节 隋唐以后的纪传体编纂观念	208
一、“修史取鉴”与“治心治世”	208
二、辨明正统	213
三、“国灭史不灭”	218

第六章 典制体编纂观念的进步 222

第一节 “统括史志，会通古今”	222
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222
二、“统括史志，会通古今”	224
三、“以类相从，举其始终”	227
第二节 郑樵的会通与“自得”	229
一、“会通之义大矣哉”	230
二、“详文该事，无待美刺”	232

- 三、“一家之言，自得之书” 235
- 第三节 “变通张弛之故” 237
 - 一、“会通因仍之道” 237
 - 二、“变通张弛之故” 241
 - 三、“叙事为文，论事为献，窃注己意” 244

第七章 纪事本末体编纂观念的变化 246

-
- 第一节 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和发展 246
- 第二节 “区别其事而贯通之” 249
- 第三节 “论次宋事而比之” 253
 - 一、“类总其萃，年系其时” 253
 - 二、“论次宋事而比之” 254
- 第四节 “广稽博采，勒成一编” 256
 - 一、“广稽博采，勒成一编” 256
 - 二、“各附论断，曲折详尽” 259
- 第五节 “因事命篇”与“尽事之本末” 261

第八章 学案体与黄宗羲的编纂学思想 266

-
- 第一节 学案体的创立和发展 266
 - 一、学案体的学术渊源 266
 - 二、学案体的创立与发展 268
 - 三、学案体向章节体学术史之发展 271
- 第二节 黄宗羲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273
 - 一、“学有宗旨” 273
 - 二、“一本而万殊” 274
 - 三、“分源别派，宗旨历然” 276

第九章 史注、史评、史考中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279

第一节 经世致用与鉴往训今 280

一、经世致用的治史宗旨 280

二、鉴往训今的史学功用 293

第二节 直笔求真 298

第三节 博采善择与辞达为上 313

一、博采善择的取材标准 313

二、辞达为上的表述要求 318

第四节 史家的修养 324

第五节 史不拘例，因事命篇 332

第十章 近代以来历史编纂学的若干问题 346

第一节 章节体的引入与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346

一、章节体的引入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346

二、章节体的引入与史书编纂观念的变化 349

第二节 百年来历史编纂学理论的探索和实践 356

一、章太炎编纂中国通史的构想 357

二、梁启超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思考 360

三、白寿彝的史书编纂理论与实践 366

本卷主要引用书目 374

绪 论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编纂学

什么是历史，或者说历史是什么，古今中外的史学家、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许多不同的回答，尤其近代以来，学者逐渐作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明确界定。如梁启超、李大钊、何炳松、王云五、缪凤林、柯林伍德、克罗齐、爱德华·卡尔、马克·布洛赫等等，都有明确论说。^① 值得重视的是，吴怀祺先生从总结和发展民族史学、民族文化的高度提出了新颖的认识，他说：“以易之三义即变易、不易、易简三者论史，才能把握历史的本质”，“变易是‘易’的根本的属性，同时也是‘史’的根本的属性”，“没有变易，就不可能产生历史；没有不易，没有变中的相对

^① 可参见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大钊《史学要论》、何炳松《历史教授法》和《历史研究法》、缪凤林《历史与哲学》、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爱德华·卡尔《历史什么》、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等论著。

不变，事物永远是无定形的，也不能有这个事物的历史的形态；没有‘易简’，各种历史的界限泯灭了，具体的历史形态同样形成不了。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产生历史，产生不同形态的历史，产生自然的历史，产生社会的历史”。^①

综合各种认识，“历史”一词大体有两种涵义：

其一，是指客观世界的发展过程，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本身。这种历史一经消失，即无法恢复和重来，后人只能凭借过去留下来的古迹和在地下发掘出的实物来了解一些个别的情况。客观存在的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泛指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发生和存在过的事实，或者说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狭义的历史，则专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人类过去的往事，这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并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已成为过去的社会发展过程，它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

其二，是指人们用文字记载和编写的历史，或者说，是对往事的记述和研究，这是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一门学科，即历史学。人们通常说的历史，往往就是指这种记载和编纂的历史。这种历史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历史事迹的记载，二是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评论。按照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说法，前者叫做“记注”（资料汇编），如起居注、实录等；后者叫“撰述”（著述），如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因为这种历史是由人们记载和撰述的，记载和撰述是有意识、有选择的，取舍的标准便是作者的主观条件，其中难免有作者主观意念的参与，作者的知识水平、思想观念、认识能力、感情色彩等都会不自觉地渗透在记录中，这就使得历史带上了一定的主观成分。所以，记载和编写的历史不一定符合历史本身实际情况或者不完全符合，甚至完全不符合。正因如此，拿破仑戏称“历史是一则约定俗成的寓言”。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历史这种东西只不过是一种大家都同意的故事”。英国

^① 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81~82页。

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则云：“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① 他们都在强调：构成“历史”的事实都是由人来选择、归类和编排出来的。白寿彝先生曾指出：“文字记载的历史并不能代替客观存在的历史的本身。这是因为，第一，‘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几千年，而人类社会发展已有的过程，不知有多少万年。……第二，在有文字记载以后，即使是对一个时代或一件史事的过程，文字也不能全部反映出来。第三，历史是客观的存在，而文字记载则是作者根据自己的接触而写出来的。不管作者写得如何好，却并不等于他写的就是历史的本身。”^②

无疑，人们用文字记载和编写的历史，既包括历史本身，又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这种历史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学或历史科学，简称史学。后人主要依据这种历史（历史学）去了解历史本身（客观历史）的情况，刘勰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③ 正是此理。为了保证人们能认识到真实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教育和启示，古今中外的历代史学家们一直把求得真实的历史史实作为自己的首要追求，提出了“德、才、学、识”的主体修养要求。影响所及甚至超出了历史学科，对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都产生了影响。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就曾称：“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为最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④

综上，“历史”之涵义一则指客观的历史；一则指记载和编写的历史。通常把前者称历史，而把后者称历史学或史学。

①（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5页。

②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③ 《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

④ 《随园诗话》卷三。

历史学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记录和撰述。而人们记录和撰述客观历史是讲究方法和理论的，这些方法和理论就构成了历史编纂学。故历史编纂学实际上就是关于记录和编纂历史著作的具体方式、具体方法的学问，涉及史书编纂形式、史书的内容、史书的文字修饰，举凡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和筛选，史书体裁的选择，史书的体例安排，史书的文字表述技巧等等，都属于历史编纂学。^①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十分发达的历史编纂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连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②，“中国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国家之一”^③。这份辉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是值得重视、总结和借鉴的。

第二节 史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

白寿彝先生说：“我国在史书编撰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些理论方面的论述，都值得总结。”^④ 我国古代丰富的历史编纂学遗产主要表现为多姿多彩的史书体裁、体例和丰厚的史书编纂成果，而体裁和体例的具体运用，则反映了史家、思想家们对史书编纂的思考、认识和观念，即历史编纂学思想。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史学思想

所谓史学思想，极简略地说，就是人们对于史学的看法。著名学者何

① 参见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④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兆武、陈启能、瞿林东、吴怀祺等先生对史学思想都有专门论述。^① 他们的认识基本一致又略有区别，如：吴怀祺先生把史学思想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史家（包括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史家对史学工作方面的认识。并指出各自应该包含的内容和应注意的问题。^② 瞿林东先生则将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直接作了区别：史学思想是关于史学本身的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史家之修养与批评的理论。其基本范畴和主要问题是：史家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直书与曲笔，史学功用，史学审美，史学与经世，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历史思想或历史观念，则是指人们对客观历史运动的认识。其基本范畴与主要问题有：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循环与变化的关系，人君、将相和其他各种人物以及民众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历史鉴戒思想和多民族同源共祖的思想等等。史学思想同历史思想既区别明显，又联系密切，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可以相互包容的。当我们把史学活动作为一种历史活动来看待时，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当包含在历史思想范畴之中；而当我们把所有的人们关于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认识也纳入史学活动的一部分进行研究时，这种认识即历史思想也就包含在史学思想中。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③ 何兆武先生则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两者虽然都可以用‘历史哲

^① 参见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光明日报》1986年8月6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瞿林东《史学志》第六章、第七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史》第一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② 详见吴怀祺主编：《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先秦卷》，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156~157页。

^③ 详见瞿林东、李珍：《范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114页。

学’一词来概括，但大抵前者即相当于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后者则相当于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①

不论笼统地称史学思想或史学理论，还是具体划分为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都必须明确，史学领域的理论有两个方面或两个部分组成：一是人类对客观历史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二是人类对历史学自身问题的理论探索及其成果。而且，二者存在许多交叉、重叠甚至包容之处。对客观历史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即为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理论考察及其成果即为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

史学家、思想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是弄清历史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何在。就历史是怎样变化发展而言，曾形成了历史倒退论、历史循环论、历史停滞论、历史进化论、历史螺旋式发展论等多种认识；关于历史变化的动因，则有神意史观、英雄史观、经济史观、文化史观、种族优越论、地理环境论等多种看法。史学家、思想家们不同的回答，正表明了他们不同的历史观。

史学家对史学自身的认识，主要是考察史学有什么用、历史学研究该怎么做等问题。在史学功用上，最重要的是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个方面，前者是史学的学术功能，后者是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必先求真，而后才可致用。进而又有了才、学、识、德的要求，有了秉笔直书的要求等等。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当然，历代史家对于史学功能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甚至相同的命题，也往往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涵，需要多做具体分析。在历史学工作如何开展上，形成了种种关于史学方法的认识，如史料方法论、历史方法论、历史编纂学、史文表述的方法、史学批评的理论与方法等等，史学家们不断地对这些问题作出探索、总结和实践，从而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发展，也推动着史学方法的改进，最终深刻地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与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①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载《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性，并将研究成果载诸文字，传于后世，供人们学习、参考和借鉴。因此，在史学方法论上，也就形成了历史研究之法和史著撰述之法，史著撰述之法即为常说的历史编纂学，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记载和编纂历史，如何记载和编纂历史。历史编纂学作为史学家对史学自身认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其丰富的内涵和特殊的意义。

二、历史编纂学思想

如果说史学思想是人们对于史学的看法，那么历史编纂学思想就是人们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看法。作为史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编纂学是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的，相应地，历史编纂学思想就是研究史书撰述方法的理论。换言之，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史学家对历史编纂学的理论认识。前面谈到，历史学是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记载和编纂，人们记载和编纂客观历史是要讲究方法和理论的，需要编纂历史的指导思想，即历史编纂学思想。由此看来，历史编纂学思想要解决的是历史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即史家以什么编纂形式来反映社会、反映历史，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特定形式，其背后支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和观念。

需要指出的是，方法与理论往往是相通的，有时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诚如杜维运先生所言：“史学方法起源于思想，也与理论相通。思想接近理想，理论接近实际。史学上的理论，与史学方法，有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不虚美，不隐恶’，是一种理论，实践起来，就是一种史学方法了。‘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是一种史学理论，应用到历史写作上，就是一种史学方法了。相信较古的记载，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是一种史学理论，定为标准后，就是一种史学方法了。大抵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差别，在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当抽象时，是史学理论；当具体时，是史学方法；当史学方法最细致亦即最具体的时候，是史学理论的最大发挥。”^① 历史编纂学（史著撰述方法）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的关系也复如此，很难将编纂思想与编纂方法截然分开。

^①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历史编纂学的基本问题应包括：史书的编纂目的、史书的体裁与体例、史书的编与著、史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史书的史文要求、史家考察历史的方式以及史家自身的修养要求等诸多方面，历史编纂学思想，就是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及其成果。在这些问题上，唐代史家刘知幾的《史通》，清代史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以及当代史学家张舜徽、白寿彝等，都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本书的研究，就是力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总结历代史家关于历史编纂学方法和理论的理性认识，汲取其思想精华，更好地为当今的历史编纂学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